



空间社会学视野下大学生寝室的文化共同体建构

金明磊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公共教学部, 杭州 311200)

摘要: 大学生寝室是一个具有复杂社会属性的空间场所, 仅仅关注其教育属性或社交属性难以完全解决大学生寝室存在的矛盾冲突。空间社会学视野下, 大学生寝室存在价值认知不一致、文化资本差异明显、个体与群体间关系越界的矛盾冲突。寝室文化共同体作为由个体凝聚而成的群体, 它基于空间成员从主观感性到关系理性的追求, 能够实现寝室成员在理想目标上由现实目标到价值目标的超越。寝室文化共同体的这些特性不但让共同体更加稳固长远, 而且能有效解决大学生寝室存在的矛盾冲突。挖掘大学生寝室文化的最大公约数, 凝聚寝室文化共识, 是构建该文化共同体的有效实践路径。

关键词: 文化共同体; 文化共识; 空间社会学; 大学生寝室; 构建

中图分类号: C91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6-0300-07

Cultural community construction for college dormi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ociology

JIN Minglei

(Department of Public Education,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 Hangzhou 311200, China)

Abstract: The college dormitory is a spatial place with complex social attributes. It is difficult to completely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existing in the college dormitory simply by focusing on its educational or social attribut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ociology,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in the inconsistent value cognition of college community, obvious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capital, and the cross-border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As a group of comprising individuals, dormitory cultural community is based on space members' pursuit from subjective sensibility to relational reason, and can achieve dormitory members' ideal goals from realistic goals to value goals.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al community not only make the community more stable in the long term, but also effectively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s existing in the college dormitory. Digging the largest common divisor of college dormitory culture and consolidating the dormitory cultural consensus are effective practice paths towards a cultural community.

Key words: cultural community; cultural consensus; spatial sociology; college dormitory; construction

寝室作为高校学生最小的群体活动空间, 具有复杂的社会属性。一方面, 寝室是高校空间设施的一部分, 和高校整体空间具有相同的教育属性; 另一方面, 寝室作为大学生日常生活起居的活动场所, 同

样具有日常生活属性。大学生寝室是一个教育属性和生活属性交融、个人空间和群体空间重叠的场所, 这使其相对于教室、私人房间来说具有更加复杂的社会属性。据调查, 目前大约有 2% 的大学生寝室

收稿日期: 2019-12-15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4-23

基金项目: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9LLXC030)

作者简介: 金明磊(1987-), 男, 河南南阳人, 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方面的研究。

人际关系不融洽^[1]，寝室复杂的空间社会属性，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矛盾冲突的发展。

面对大学生宿舍中的寝室矛盾冲突，李文辉^[2]认为大学生在寝室生活中，以自我为中心地寻找群体认同，会引起群体分类，致使“加重效应”和“离弃效应”更加突出，个体和群体以及寝室内不同群体间的相互认同会引发矛盾冲突。郝雨等^[3]认为大学生寝室是一个具有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双重属性的实体空间，通过集体记忆的方式去构建良性的空间氛围对解决寝室冲突具有一定的可行性。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司文晶等^[4]发现文化营造与宿舍共同体的产生有着一定关联，王寓凡等^[5]则从“空间形态-社区生活-情感认同”三个层次入手，通过符号化、仪式性的社区活动来强化社区学生的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以期塑造稳定、和谐的高校社区情感共同体。通过对相关研究梳理，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已经开始关注大学生寝室的空間社会属性，从寝室空间属性着手去探索大学生寝室矛盾解决的有效路径，同时大家也都认识到寝室的文化建设是营造和谐寝室环境的要素。

在当前“三全育人”的教育背景下，如何破解大学生寝室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冲突，让寝室成为全体成员共同成长成才的场所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基于前人研究成果，本文将从空间社会学视角切入，深入探究寝室矛盾的根源所在，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共同体理念为理论支撑，打造寝室文化共同体，驱动大学生寝室全体成员实现共享共赢的和谐发展局面。

一、空间社会学视野下的寝室矛盾冲突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中指出，空间作为社会关系行为的存在场所，具有重要的社会属性，他从物理学上把空间分离出来，将其纳入社会学的讨论范畴，并总结了空间的五种社会特质：排他性、分割性、对社会关系的固定效应、空间接触对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改变以及行动者空间流动与社会分化的相关^[6]。这种将物理空间和社会属性联系起来的观点，为空间社会学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寝室作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场所，属于通过人的行动和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具体化的空间。在这个具体化空间中，不同行为主体通过各自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共同塑造寝室这一群体性场所的社会属性，当寝室内的大学生在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共同文化特征趋同时，空间内的

主体相互间趋向稳定，反之则趋向矛盾冲突。

空间社会学视角是社会学研究视角之一，将寝室放在社会这一大背景下探讨，它更加注重在寝室内各个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社会关系和自身价值背景相互交融状态下，对主体进行行为分析，为透析大学生寝室中复杂的多边关系与行为提供了另类视角。它超脱了以往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旁观者视角或心理学的主客体互动研究视角，致力于关照大学生寝室整个空间场所中所有行为关系总和。基于空间社会学的大学生寝室关系研究，不仅应重视影响寝室行为关系的群体和个体行为，而且还应挖掘这些行为背后所蕴含的价值特征和影响来源。把发生在寝室内所有的有形行为和无形关系当作一个整体事件去对待，能对大学生寝室有一个立体而清晰的认知，进而引导教育者去破解大学生寝室中存在的矛盾冲突，构建一个和谐发展的寝室空间。

(一)对寝室的空間价值认知不一致

大学生寝室作为一个多重功用交汇的场所，其在空间价值特性上具有多重性，但这也导致空间活动的各方参与者的对其价值认知不一致。大学生寝室从物理空间功能上看，是大学生进行日常生活的休憩场所。从附属关系上看，它属于高校教育空间的拓展部分，被教育者赋予教育价值和功用，教育者大多期望通过各种活动在寝室空间中进一步深化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寝室成为一个受到教育者管理监督的、和教室类似的受教育空间。从空间的社会性上看，寝室不但是大学生日常交流交往、娱乐活动和其他各种社交行为发生的场所，同时也是寝室内各个大学生社会性共存的一个同存性空间。这种行为关系模式符合吉登斯提出的“共同在场”理念，他认为个体在日常活动过程中，在具体定位的互动情境下，与那些身体和自己共同在场的他人进行着日常接触^[7]。在寝室这个同存性空间内，个体行为不再是一个单独的孤立事件，它与周围同一空间内的其它行为关系都存在关联，这种关联也就构成了寝室成员间复杂的空间关系。

寝室内部成员和高校教育管理者都无法对寝室的空間价值形成全面认知和共识，教育管理者的教育价值、学生群体的生活和社交价值、学生个体的微观行为模式三者间就容易发生矛盾冲突。当寝室空间内外的主客体间对寝室的空間作用共识大于差异，形成社会关系平衡时，才能有效保证寝室空间的和谐发展。

(二)文化资本差异带来的冲击与碰撞

文化资本是一种区别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资本形式,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包括三种形态:身体化文化资本、物质化文化资本和制度化文化资本^[8],但他并没有精确界定文化资本的内涵。在米歇尔·拉蒙特(Michele Lamont)和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看来,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实质上是指制度化的精英文化,包括言谈方式、仪态修养、行为习惯、人际交往等^[9]。

目前高校学生寝室分配多由到校报到顺序或行政强制决定,学生寝室成员间文化资本差异较大。在寝室中,当文化资本优势一方和薄弱一方在文化互动上形成碰撞时,空间在文化结构上的平衡状态就会被轻易打破。寝室成员间文化资本的差异不但会导致生活行为习惯不同,而且还会导致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存在差别,认知双方对相同事件出现不同看法时,寝室的空間稳定性就容易遭到破坏。

在寝室不同文化资本背景相互交融下,巨大的文化资本差异会引起寝室内部成员间的文化冲击。这种文化冲击在性质和方向上均具有双向性。从性质上看,文化冲击可能会引起寝室成员间矛盾冲突,同时也能够引发文化流动和文化资本的传递,使文化资本积累薄弱一方进行文化再生产,增强自身文化资本。从方向上看,并非全由文化资本积累深厚的一方对文化资本相对薄弱一方形成冲击,也有可能是逆向冲击,这种文化冲击和流动,对寝室内部成员来说,既是矛盾发生的源泉也是共同进步的机遇。

(三)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越界

寝室空间是一个群体和个体共存的场所,在这个场所内,群体空间和个体空间、群体活动和个体活动、群体社会关系和个体社会关系杂糅,难以准确理清每组关系内两者的边界,这就导致寝室群体和个体间会经常出现关系越界的行为,不管这种越界是否具有主观性,都会打破另一方的心理安全范围,造成空间侵犯。空间边界不管在动物社会还是人类世界都广泛存在,动物世界中对群体或个体的空间边界侵犯,在另外一方看来是一种具有威胁性的攻击行为。而人类社会中的空间侵犯会对被侵犯一方造成心理上的威胁和压迫,即使这种行为在主观上并不具有威胁性。

国内高校由于硬件条件限制,一个寝室的建筑面积约在20平方米,成员以4至8人为主。狭窄逼仄的物理空间压缩了每一个寝室成员的空间距离,群体和个体进行活动时,必须时刻注意自身所波及

的空间范围。通俗来说,这种对于自身活动的范围控制是一种文明素质的体现,但是在微观上看来,这是多个群体(或个体)在空间心理安全距离保持上所做的努力。生活用品摆放保持的物理距离、洗漱如厕的时间安排、娱乐学习时声音音量控制、群体交往时的亲友来访以及社交过程中的身体接触都需要考虑群体(或个体)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问题。只有全面考虑所有的空间活动,才能保持正确的空间生活距离,使群体和个体居于正确的位置,保证两者间的关系不越界。

但是这种平衡状态仅存在于理论中,现实的寝室空间生活中,由于生活习惯差异,不同个体间对于个人空间的界定也不相同,这就导致群体和个体的行为边界更加难以理清,因此个体和群体的关系越界行为经常发生。当某一个体或群体的空间被侵犯时,就可能引发寝室矛盾冲突。

二、共同体理念与文化共同体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曾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10],这是习近平主席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中对于共同体的认识,为世界和平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共同体理念在宏观空间上适用于人类命运发展,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考验的共同体理念同样适用于微观空间的和谐关系构建上。在空间社会学视野下,面对寝室矛盾冲突,共同体理念的转化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大学生和谐寝室空间关系构建上的有效举措。

(一)共同体是从主观感性到关系理性的追求

共同体(community)是一个充满积极意义的社会组织词汇,相较于其他的社会组织语汇(例如state、nation、society等),它不会被赋予明确的反对意涵或具有区别性的意涵^[11]。共同体就是一个基于共同目标和自主认同、能够让成员体验到归属感的群体。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也是共同体赖以生成的基本要素^[12]。

后现代主义哲学关注人类社会过程中对于人的主观感受和人的中心性的剥夺,更加强调人的主体性和价值内涵的丰富性。去中心、去整体以及去同一是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追求。随着这种哲学思潮的盛行,年轻一代更加追求个体中心性,强调个体主观感受,这是对寝室空间稳定性的天然挑战。促进寝室成员由主观感性走向主观理性进而到达关系

理性的境界,打造真实的共同体是消解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对寝室空间稳定性破坏的有力逻辑路径。

主观感性以个人为中心,突出强调个人的主体地位,面对寝室空间中的各种关系交织时,从个人中心为出发点去进行个体中心性行为活动。每一个个体都需要在寝室空间场所中占有足够的空间范围才能确保各自的个体中心性不受侵犯,在寝室群体生活中,过分强调个体的主观感受会造成对同一空间内其他个体和群体的压迫,这种以主观感性为基础的个体中心性在寝室空间生活中引发矛盾冲突是必然且不可调和的。

共同体旨在打破个体中心性壁垒,以关系理性为基本原则,确立“为他人的主体性”观念,为克服“主观理性”与“共同感”的矛盾提供思想前提,在推动个人自由个性发展的同时,促进人们之间的联合^[13]。

马克思在讨论人的本质属性时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属性是在寝室空间中建立“关系理性”的前提。关系理性要求个体关注人的社会关系总和属性,从人的社会关系交往性和依赖性两个层面展开,对自身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予以哲学高度的思考,不仅关注自身主观性感受,同样关注自身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当个体关注人的社会关系属性时,寝室空间才能形成真正的基于社会关系认知的互相促进型场所关系,进而奠定共同体构建的社会关系基础。

(二)共同体是由个体共同凝聚而成的群体

共同体不是简单的团队团体或群体,它并不否认和压抑个体性,而是在个体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建立的一种合作发展型社会关系组织。寝室共同体的打造是寝室成员在达成共同目标的基础上,通过相互间社会关系的自我认同、身份认同与群体认同,营造一种具有归属感的空间场所。

首先,寝室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充分尊重个体。共同体并不是只讲团队忽视个体的组织类型,它强调团体,而且是在个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团体。在寝室空间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之间的行为或活动主体都是个体。当个体在空间中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时,整个空间场所的关系稳定性难以保持,被压制的个体随时可能会破坏空间的和谐稳定。共同体是一种共建共享共赢的合作模式,在共同体中所有个体是一个平等互利的关系状态。尊重所有个体,重视作为共同体基本单位的个体,是构建共同体时需要保持的理念。

其次,个体需要重新审视自己,追求相互间的关系理性状态。尊重个体并不代表个体在共同体中具有无限制的自由,在共同体尊重个体的同时,个体对共同体的发展具有同样的责任。个体需要在共同体中对自己进行理性审视,这种理性审视是基于共同体以及内部成员间的多维关系审视,并不仅是对自身进行主观理性审视。这种审视需要构建的是一种关系理性状态,让个体和群体以及其他个体间的社会关系处于理性状态。因此共同目标和身份认同就成为共同体的必要条件,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个体才能够对自身主体理性进行充分挖掘,并且通过由主体到群体的理性审视,构建一种渗透在自身价值观和行为中的关系理性。

再次,共建共赢共享是共同体的发展目标。寝室共同体的建构并不仅是为了维持寝室的和谐状态,更主要是为了通过这样的一种紧密空间场所关系,让全体成员实现共同发展的目的。在寝室空间内实现共同发展的共赢状态,达到多方关系的和谐稳定,让全体成员参与建设,同时建设成果由全体共享。这种致力于主体参与和发展的共赢性社会关系群体,是实现共同体长期持续的内在动力。

(三)文化共同体:从现实目标到价值目标的转型

共同目标是共同体构成的基础。在目标的构成类型上,既有基于现实任务需求的实际目标,也有因价值观相近而结合在一起的理想信念目标。在学生寝室空间中打造文化共同体,是基于寝室成员共同的理想信念追求形成一种共同价值观聚合体,是一种从现实短期目标到长久价值目标的超越,能从理想信念层面凝聚更多的共识,形成心理层面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打造牢固的价值共同体。

文化共同体是一种共同理想信念在寝室空间文化中的外在表现,通过寝室共同的文化主题、文化氛围和寝室成员较为一致性的寝室文化行为活动形成的一种共同体。相对于其他类型共同体在目标结果上的高度趋同,寝室成员构成的文化共同体在文化行为特征和文化行为过程上更加趋同。

首先,文化共同体需要寝室成员间的文化资本积累处于相近层面。为了降低矛盾冲突可能性,应对寝室成员的构成进行前期人工干预,通过问卷等一系列筛查方式,将文化资本相近的学生安排在一个寝室中。这样能为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坚实的文化资本基础。

其次,寝室需要有明确的文化主题和一致认同的文化氛围,这是将寝室成员间松散的文化理念凝

聚成为共识的有效手段。较高凝聚力的文化共识经过长期发展才能形成一个稳固的文化共同体。明确文化主题和文化氛围,是寝室成员在形成文化共同体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向前并且目标如一的内部驱动力。

最后,寝室空间成员应该树立超越现实的长远目标。如果文化共同体的凝聚是基于寝室成员间的短期目标,在特定时间段内的激励效果可能会强于长期目标。这种共同体的生成时间较快,但是持续时间较短,在短期目标完成后,共同体就会垮塌,具有不可持续性。文化共同体旨在对学生的大学生活全过程产生影响,需要长久的持续力和稳固性。并且文化共同体难以在短期内形成并显现出价值效果,这就要求共同体成员需要树立基于大学期间的目标,长期目标会形成持续的激发动力,在前期给文化共同体形成提供一个稳定目标,在后期给文化共同体持续建设以现实目标激励。

三、从文化共识到文化共同体的构建

大学生寝室虽是一个小微空间场所,但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功能在这里交融后,它也具有一定的空间文化结构复杂性,文化资本和文化认知造成的文化冲击更易引发矛盾冲突。同时,学生宿舍作为一种教育空间场所,会受到教育管理者主导和管理。以大学生寝室为例的文化共同体建构正是利用这一场所的教育属性,让学生成长和空间文化相互促进,借助大学生寝室在空间、文化和管理三方面条件去进行文化共同体的建构的理论实践,并且检验理论的适用性,为文化共同体理念扩大到更加广阔的空间场所提供实践基础。

(一)文化共识:寝室空间文化升华到共同体的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立需要文化的支撑,形成文化共识^[15],寝室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同样需要形成文化共识。文化共识是在寝室空间多元文化基础上,形成得到全体成员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理念。文化共识是对寝室空间价值认识的统一,是对寝室成员文化资本差异的消融。打造文化共识,是将寝室成员凝聚起来,走向文化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文化共识是在寝室多元文化的基础上,找出最大的文化公约数,形成寝室成员对寝室空间文化行为和场所价值作用的同向认知。在寝室空间交织的多元文化中,寝室成员形成统一的文化认知较为困难,但找到全体成员都认可的文化认知点则较为简单。文化共识就是在充分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基础

上,搁置争议达成共识,实现互利共赢的文化行为。

文化共识的凝聚作为通向文化共同体的必由之路,是通过对个体主观性的理性考察,找出群体共性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行为主体进行对话和交流。寝室空间多元文化交织情况下,寝室的文化共识不但需要得到寝室内部成员的认可,还要得到寝室管理者以及所在院校的教育工作者认可,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共识。对话和交流就成为多方参与下文化共识凝聚的首要条件。以寝室为核心单位,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对话和交流,才能够寻找出寝室空间中所有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进而形成有效的矛盾症结和文化共识清单。

其次,寝室多元文化参与方的行动力是决定文化共识形成的关键要素。理论到实践的差距需要行动来弥补,在经过多方对话交流后,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共识已经基本达成,但是这种存在于思想上的共识对于构建真实文化共同体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文化共同体是一个多方主体参与的实践行为事件集合,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出现个体掉队,那么整个共同体就可能在极短时间内解体。知行合一是确保长期稳固的文化共同体构建的重要实践基础。

最后,文化共识要注重不同寝室的的不同文化特征,其在操作和理论层面上具有推广价值,但是在核心文化的凝练上需要寝室空间参与者进行单独提炼,核心文化特征并不具备复制价值。群体越大越难求出文化公约数,也越难达成共识。因此文化共识是由一个个寝室个体单独进行凝聚升华的,他们之间的文化行为千差万别,凝聚出来的核心文化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教育管理者在院校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尊重寝室文化特征差异。

(二)大学生寝室文化共同体建构的路径

大学生寝室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是在空间社会学视阈下的文化实践,它对学校和寝室两个层面均有不同程度的要求。这种要求是空间社会学作为一种理论来指导实践所需的准备工作,同时又构成层级递进的发展逻辑,补足了大学生寝室文化共同体建构的逻辑进路。

在学校层面上,需要对寝室空间功能有明确认知。学生寝室是集教育、生活功能于一体的空间场所,功能杂糅使得无法准确界定发生在寝室中各类行为关系的具体性质功能。但这并不能成为寝室脱离学校文化场独自发展的理由,寝室作为教育机构的内部附属,具有天生的教育功能。学校应成为寝室文化建设中的主导力量,通过校园文化建设、文明

寝室建设等各种空间文化活动来促进寝室文化共同体形成。如举办寝室文化节,倡导和谐文明寝室风气;开展党员干部教师联系寝室活动,形成关照学生发展机制;扎实推进辅导员、班主任定期走访寝室,把寝室空间的矛盾问题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外界力量的督促和引导下,松散的寝室文化共识才能凝聚为稳固的文化共同体,这是一个外部力量和内部动力交替发力的过程。

在寝室层面上,当文化公约数和文化共识得到凝聚后,还须开展各种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长期建设活动来确保文化共同体如期形成。首先寝室所有成员需要共同制定寝室公约,明确寝室各项事务的责任与边界,并将寝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张贴在醒目位置,起到符号化的提醒作用。其次需要挖掘寝室文化公约数,确立寝室文化主题,让寝室文化主题凸显在寝室装饰布置、寝室集体活动安排、寝室风采展示等各类集体活动和展示演示中,让文化主题由内隐的发展动力变为外在的寝室文化符号象征。再次寝室成员之间需要推举一名积极主动、有上进心的人成为寝室长,让其成为文化共识的领头雁,发挥带动引领作用。寝室长并不一定是个人能力最优秀的人,但一定要是具有最大文化公约数和文化共识集聚的人,这样才能团结所有同学使寝室形成有效的共同体。最后在达成共识基础上,寝室成员需要通过符号化活动让情感融入共识,形成具有情感纽带的文化共同体。寝室成员可以通过集体项目、生日聚会、团建、出游等形式打造感情纽带,为文化共同体添加情感基因,让寝室文化共同体更加稳固和长远。

为了更加有效地检验大学寝室文化共同体理念的实践价值和路径,笔者所在研究团队在杭州师范大学、浙江理工大学和浙江旅游职业学院三所高校部分院系的2018级新生中,安排文化行为和文化资本相似度较高的同学入住同一寝室。通过为期一年的实践检验,发现以此为基础组成的学生寝室在矛盾发生率上较2017级学生有所下降,文明寝室检查优秀率则高于2017级新生。这项实践结果可以说明,当文化资本和文化行为相近的学生组成一个寝室时,寝室内部的行为关系因文化公约数较大的缘故,处于一个和谐稳定的状态。另外还发现,构建寝室文化共同体所要求的文化共识并不一定需要强烈的文化资本基础,当寝室内部出现主流文化行为时,这种文化行为就具有极强的传染效果。因为4人制或6人制寝室住宿条件的客观制约,对于某些寝室

中存在文化资本和文化行为差异较大的情况,寝室成员存在着文化行为随大流的从众效应。这也给大学生寝室这一文化共同体的建构带来启发,文化共同体的基础并不需要完全相同或接近的行为目标,它内部可以求同存异,共同体的主要特征和主流方向对内部个体行为有重要影响,群体带动个体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一种发展状态。

四、结 语

大学生寝室是人、空间和社会关系三者交互的场所,充分考虑三者的互联互通,才能有效理解该空间场所中所有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空间社会学视阈中,寝室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空间场所。从全体成员协同和谐发展的思想出发,深入挖掘寝室空间最大文化公约数,构建一个基于文化共同体的和谐寝室关系,是一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用寝室这一微型社会生活场所去检验空间社会学理论的适用性,为文化共识、文化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同时,这也是一种解决当前大学生寝室矛盾冲突的有效理论和实践方法。高校在进行学生寝室分配时应充分考虑文化资本和寝室文化行为对于构建和谐空间关系的影响,学校可通过问卷调查等形式将寝室成员分配工作前置于新生现场报到,用行政干预代替自然发展,引导学生在寝室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上和谐成长、共同进步。

参考文献:

- [1] 赵小红,朱楠.大学生宿舍人际关系调查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9(4):90-96.
- [2] 李文辉.最熟悉的陌生人:大学生宿舍人际冲突个案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36(3):87-93.
- [3] 郝雨,朱媛媛.冲突与协商:私人空间兼公共空间的大学生宿舍[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5):98-103.
- [4] 司文晶,宣朝庆.文化营造与宿舍共同体的生产:以恒源纱厂《人事科女工管理处记事》为核心的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9,34(3):75-98.
- [5] 王寓凡,杨朝清.空间视域下高校学生社区情感共同体建设[J].中国青年研究,2019(2):20-26.
- [6]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M].林荣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 [7] 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李康,李猛,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138.
- [8] Bourdieu P. Forms of capital[J]. Journal of Economic Sociology, 2002, 3(5): 60-74.
- [9] Lamont M, Lareau A.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J].
Sociological Theory, 1988, 6(2): 153-168.

[10]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2017年1月18日,日内瓦)[N]. 人民日报, 2017-01-20(2).

[11] 雷蒙·威廉斯.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 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6:127.

[12] 张志旻, 赵世奎, 任之光, 等. 共同体的界定、内涵及其

生成:共同体研究综述[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0, 31(10):14-20.

[13] 贺来.“关系理性”与真实的“共同体”[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6):22-44.

[14] 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37.

[15] 叶小文.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共识[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37(3):1-5.

(责任编辑:楼倚杉)